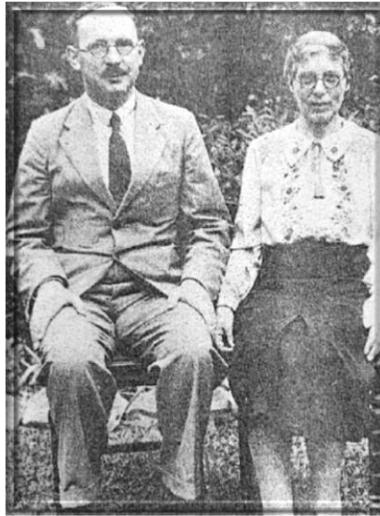


杭州扶輪社社長--蘇達立醫師

戰火的歲月中--為杭州百姓提供了生命的蔭庇

中華扶輪史研究員 劉敬恒 / 2016年9月1日



抗戰爆發前夕，蘇達立醫師伉儷在廣濟醫院花園內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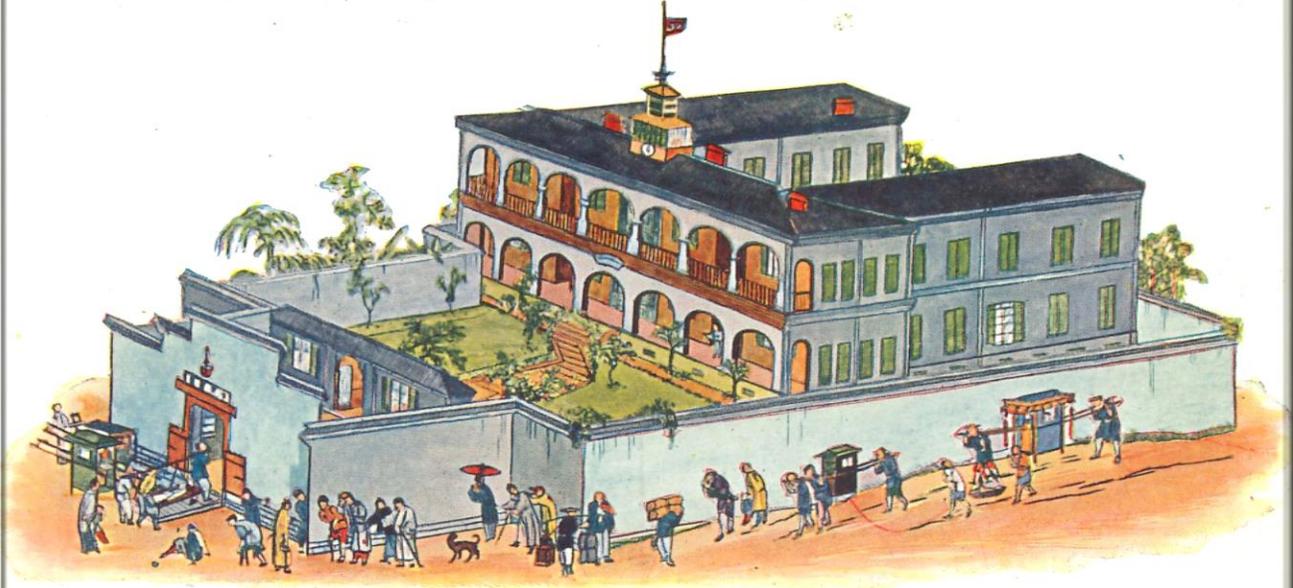
有人稱他為「杭州的拉貝」(Rabe of Hangchow)，在 1937-1942 年戰亂期間，他帶領著許多醫務工作者，為杭州百姓提供了一個生命的避難所。他就是英國聖公會海外傳道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C.M.S., Anglican Church) 的傳教士蘇達立醫師 (Dr. Stephen Douglas Sturton, O.B.E., O.St.J., M.C., M.D.)。1921 年 25 歲的蘇達立接受教會使命，攜同新婚妻子從英國來到中華民國。在 12 月抵達浙江省杭州，任職於廣濟醫院 (C.M.S. Hospital Hangchow)---那是 1871 年海外傳道會在杭州創辦的西醫醫院；1928 年 10 月 1 日擔任該院院長。醫院是英國的標準和設備，服務主要集中在兩大範疇：(1) 內外全科醫院；(2) 癩瘋防治醫院。蘇達立在杭州，行醫傳揚基督教義先後達 30 年。

1931 年上海扶輪社 (Shanghai Rotary Club) 決定在杭州輔導成立新的扶輪社，蘇達立等 24 名社會精英參與組織了杭州扶輪社 (Hangchow Rotary Club)。1932 年 6 月 23 日獲得國際扶輪授予證書，編號 3525。這是世界上第一家華語扶輪社，也是在中華民國成立的第五家扶輪社。

1931 年 9 月日本帝國發動侵略中華，抗日戰爭爆發。1937 年蘇達立積極救治從淞滬戰場上撤退下來的傷兵，救護逃難至杭州的難民。1942 年 11 月蘇達立被日本憲兵關押在上海的戰俘集中營，後被轉移到北平的集中營。直到 1945 年 8 月抗戰勝利，日本帝國戰敗投降，才獲得釋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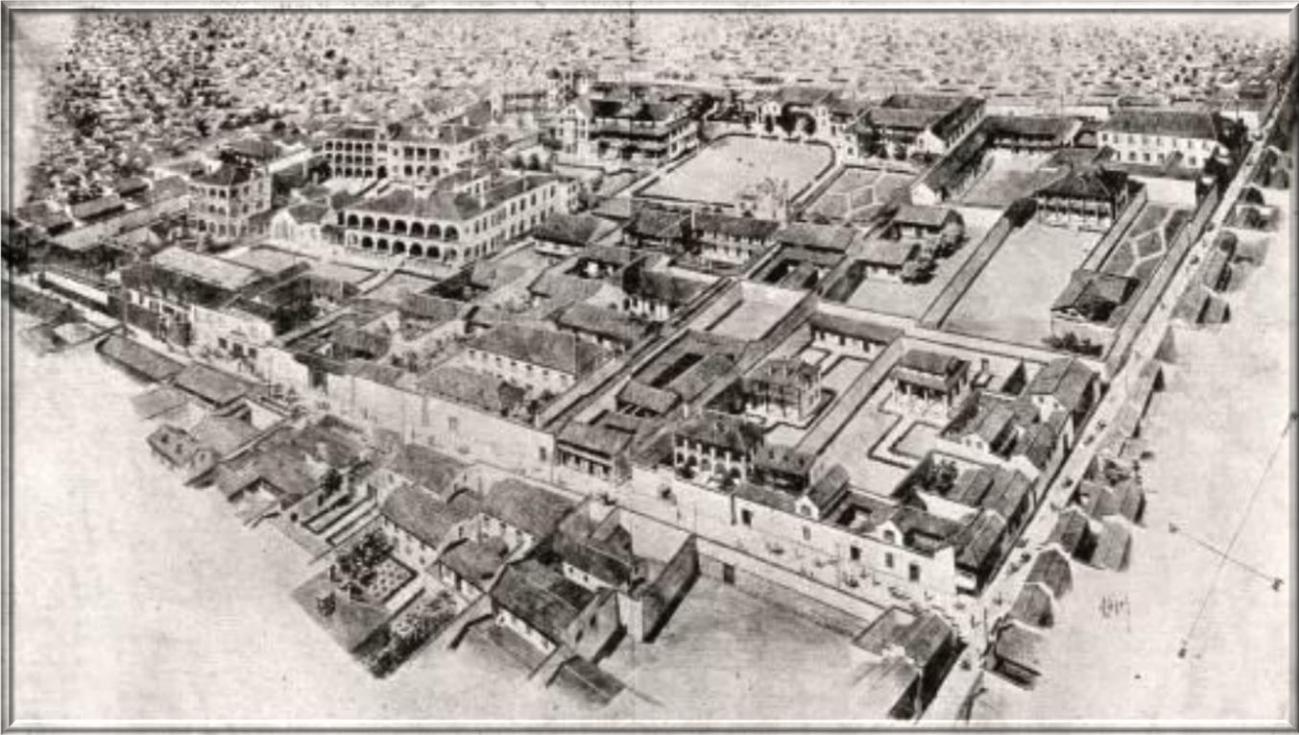
蘇達立回到杭州，繼續擔任廣濟醫院院長。另一方面，他又帶頭重組給戰亂破碎了的杭州扶輪社並擔任社長，1947 年 4 月 23 日獲得國際扶輪重新認證。

大英廣濟醫院戒烟址授徒肄業西醫圖說



9.—A CHINESE SKETCH OF THE C.M.S. HOSPITAL. HANG-CHOW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bove stand for "The great English extensively Benevolent Institution for curing Opium smoking and other diseases, and for training in the Western healing art."
 Th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cludes boiled spiders, scorpions' eggs, centipedes, horned toads, mummified caterpillars, and ground millstones. The need for Medical Missions is very great. There are now 366 Mission Hospitals and Dispensaries in China, treating over 1,000,000 cases a year.



英國聖公會海外傳道會 -- 杭州廣濟醫院 -- 本部大院全景素描

當杭州從天堂跌落地獄：

一所醫院，如何在戰亂中守衛整個城市？

當杭州從天堂跌落地獄：一所醫院，如何在戰亂中守衛整個城市？那是中國最為動盪的年代，一場浩劫正在向杭州撲來。而蘇達立帶領下的廣濟醫院在這場劫難中張開雙臂，遵循耶穌基督所賦予的使命，挽救千千萬萬中國人民的生命。1928年10月1日蘇達立接任院長時，廣濟醫院擁有500張病床，3個手術室，住院病人4,000例左右。另一方面，還在市內不同地點開辦了癩瘋病院、產科院、肺病療養院、防治沙眼診療所、醫科學校、男女護士學校等等。是英國聖公會在中國不同省市創辦的14家醫院之一，也是全國最大的教會醫院之一。

烽煙歲月的戰亂中，廣濟變身傷兵醫院。無法撤離的重傷官兵，就由廣濟醫院負責照顧。蘇達立院長領導的廣濟醫院，就收治了大量在空戰中負傷的空軍將士。後來有「淞滬會戰」中，死守四行倉庫血戰四晝夜的八十八師士兵。

四個月裡 251次空襲杭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軍隊在遼寧省瀋陽發動「九·一八事變」，百天內佔領了整個中國東北地區。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在上海爆發。擁有笕橋機場、中央航空學校的杭州，成為國民政府前線空軍基地，負責捍衛首都南京與經濟中心上海。

1937年7月7日河北省宛平縣「蘆溝橋事變」，日本帝國軍隊藉口發動全面侵略。從蘆溝橋進攻平津地區，不久華北地區淪陷，中、日全面開戰。8月13日，日本軍隊進攻上海，「淞滬會戰」爆發。當晚，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下達戰令。計劃在次日發動襲擊，企圖一舉覆滅中國軍隊的航空兵力。

8月14日，日本最精銳的鹿屋、木更津海軍航空隊，共出動18架九六式陸上攻擊機，從臺灣臺北松山機場飛向中國大陸。其中9架飛到杭州，奉命轟炸笕橋空軍基地。當日，由茅以升主持設計的錢塘江大橋仍在建造之中。這座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座雙層鐵路、公路兩用橋，也遭到日軍空襲。茅以升在《錢塘江建橋回憶》中回憶道：「轟炸的時候，我正在第六號橋墩的沉箱裡面和工程師及監工員商量問題。忽然沉箱裡的電燈全滅了，一片黑暗……電燈一滅，大家以為高壓空氣也出了事。而沒有高壓空氣，江水就要湧進來，豈非大家都完了嗎？」

杭城上空著名的「八·一四空戰」，是中華民國空軍和日本帝國海軍航空隊之間的一次攻防戰，蘇達立是見證者之一。當天下午，蘇達立和幾個朋友正在開口的亞洲煤油公司喝下午茶。當他們咽下最後一塊烤麵包時，空襲警報響遍全城。時任廣濟醫院院長的蘇達立記錄道：「空襲發生在下午4點……空襲警報嗚嗚作響。我接到醫院電話，匆匆回去。汽車駛至錢塘江大橋附近，被路警阻止。我們在濛濛細雨中，等候了兩個多小時。其間，聽到日本重型轟炸機飛越錢塘江上空及炸彈爆響聲，並看到數架中國空軍戰鬥機正在驚險追擊中。」

當時的杭州剛剛刮過一場颱風，中國空軍第四大隊調防笕橋機場才著陸，還來不及加油就遭到了空襲。在惡劣的條件下，第四大隊隊長高志航率領美國製造老鷹三型 (Hawk III)BF2C 戰鬥機 27 架緊急起飛，雙方在杭州城上空展開激戰。

「八·一四空戰」中國空軍僅有 1 架飛機輕傷，擊落日機 3 架、擊傷 1 架。打破了日本的「不滅神話」，取得了首次空戰勝利。第二天，又有三次空襲警報。日本報復，共出動了 16 架轟炸機以及 29 架戰鬥機。蘇達立抬頭就看到日軍飛機在杭城上空投彈，其中一次就發生在醫院上空，職員們跑到走廊上觀看。迎戰的仍然是由高志航領導的第四大隊，此次作戰共擊落日軍 17 架飛機。戰敗的日軍仍不信邪，第三天 8 月 16 日又再次報復，結果是日軍損失了 8 架飛機。中、日空軍的首次作戰，在短短三天內，日軍共損失 28 架飛機，這讓日本軍方高層大為震怒。當時負責此次空戰的木更津航空隊聯隊長石井義，因為給日本帶來了「恥辱」，不得已只能剖腹自殺謝罪。此次空戰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此後 1940 年，中華民國政府將 8 月 14 日定為「空軍節」，直到今天。

然而，這場來之不易的勝利並沒有帶來和平。據蘇達立回憶，在隨後的四個月裡，杭州共遭受了 251 次空襲。這座以風景優美聞名於世的城市，在一次次轟炸中，變得千瘡百孔。

烽煙歲月 八一四空戰的傷兵醫院

年前「淞滬會戰」打響之後，1937 年 9 月，包括血戰四行倉庫的許多傷兵自上海郊區搭火車來到杭州。傷兵一路夾雜著難民的擁擠，且天氣炎熱將近 38°C，還要躲過日本飛機的空襲掃射。到達杭州時，已經在沒有醫療的情況下熬過了四天四夜。廣濟醫院的醫師護士及其他職工沉著應對，妥善安置了傷兵。數星期內達萬人，住滿了所有醫院、學校、寺廟及其他公共場地。按照國際法，教會醫院可以在紅十字會的名義下救治傷兵。由於廣濟醫院為英國教會開辦，因此，也稱得上是杭州城中一個重要的「庇護所」。從「八·一四空戰」開始，廣濟醫院開始接治受傷的中國空軍及其他受傷人員。有一天，醫院接到通知要求在下午三點收容 35 個重傷者，但下午四點送進來的重傷者竟然超過 60 人。

1937 年 11 月 5 日，日軍以 3 個師團的兵力，集結軍艦 80 餘艘，在杭州灣的漕沿鎮、金山衛和全公亭登陸。在隨後的一個多月裡，日軍相繼佔領了嘉善、餘杭、富陽等地。

11 月 15 日，杭州市政府衛生處一位張處長找到蘇達立，希望廣濟醫院能夠接受無法撤離的 1,000 名重傷官兵。他說在杭州的一萬名傷兵，其中 9,000 名可以撤退到後方。但剩下的無法移動，只能留在杭州進一步治療。如果廣濟醫院能夠予以接受，則可提供醫院附近公立學校校舍作為臨時的重傷醫院，並可以撥付一切必需款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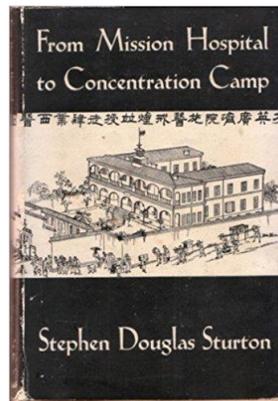
在蘇達立表示願意接受這批重傷員後，杭州市長周象賢立即支付一張國幣 5 萬元的支票。對於財政拮据的廣濟來說，5 萬元已經可以支持分院半年的經費。幾乎同時，蘇達立又收到來自英國的救濟款項。蘇達立和醫院職工慎重選擇重傷官兵 660 人，於 11 月 22 日在寒冷淒風苦雨中，

將這些傷員轉移到重傷分院，由蘇夫人及其助理人員負責照顧。12月23日，蘇達立記載：「傷兵也儘量運送離開，最後就剩下重傷不能移動者202人。」

當時美國監理會差會（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的湖州福音醫院院長孟傑醫師（Dr. Fred Prosper Manget），恰好帶領部分職員以及醫療器械撤到杭州，接手了廣濟重傷分院的工作。著名律師田浩徵（杭州扶輪社社員）擔任業務部工作，為收治難民奔走呼號。在戰亂中，難民的疾病防治一直是個難題。孟傑花了很大精力照料難民營裡面將近一萬名婦女和兒童，對他們作防疫注射、除虱和傳染病隔離。幾個星期之內，送到杭州的傷兵已達萬人。當時，連靈隱寺都闢為最大的臨時傷兵醫院。但源源不斷的傷病人還是住滿了所有醫院、學校、寺廟及其他公共大廈。而與愈來愈多傷兵相對的，是杭州城內逐漸稀少的市民。

經基督教青年會（YMCA）總幹事朱孔陽提議，由蘇達立發起邀請，杭州城內多位有聲望的外國人聯名，向中國守軍司令部，並經由英國、法國、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向日本軍方發出請求書。懇請體念傷兵、難民，並顧及天然美景和傳統文物，希望能避免在杭州市區內作戰。請求書幸獲中、日雙方軍事當局同意。但這一請求，並未起到預期中的作用，杭州最終還是從天堂跌落。

從教會醫院到集中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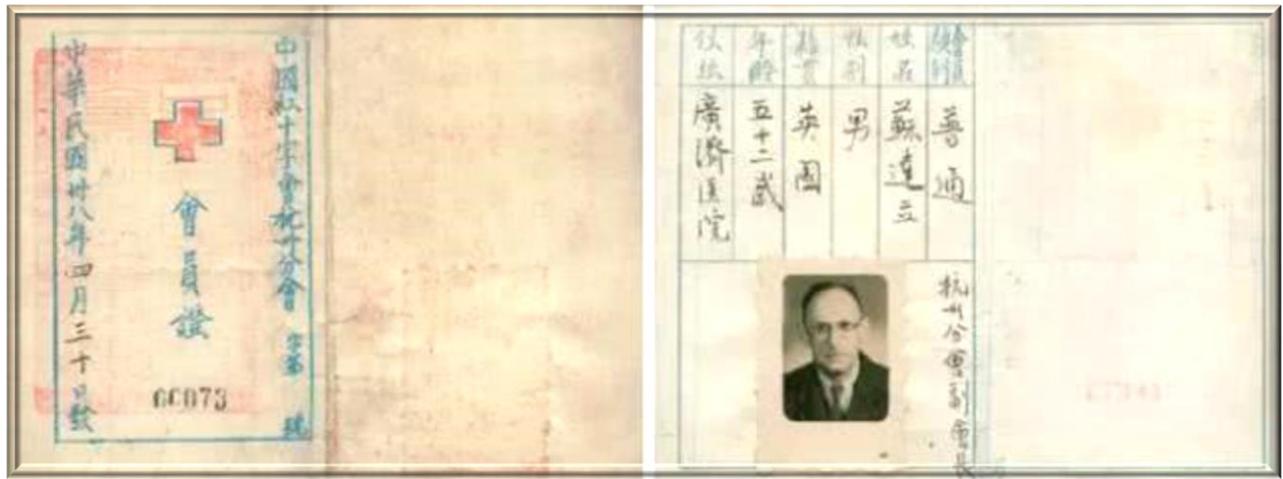
蘇達立回憶錄《從教會醫院到集中營》（1948）

《From Mission Hospital to Concentration Camp》（1948） by Stephen Douglas Sturton

蘇達立在回憶錄《從教會醫院到集中營》中寫道：「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設立難民營，以便於戰爭迫近時，民眾能獲得逃難庇護。此後，紅十字會歷9年之久仍在活動，戰時及戰後舉行會議200多次。難題實在太多，每天應付血腥場面讓人有些崩潰。而此時，我恰有撤退的良好機會。中國政府派專車護送中立國的人員撤退，但我們廣濟醫院大多數人都決心留下來。」

中國紅十字會杭州分會委員包括中、英、美、法各國人士，推選蘇達立任副會長。各個宗教組織（包括佛教）攜手設立難民營，營中懸掛起英、美、法等各國國旗及紅十字會會旗。當時，日本帝國仍會敬畏英美等曾協助日本現代化的先進西方國家。即便侵華戰爭已經持續一段時間，日、德、意軸心國陣營已經建立，日軍仍未有正式進攻已重重包圍的上海租界區及香港等西方殖

民地，以避免向英美等國開戰。在無盡的恐怖中，無數婦女、兒童和老人湧進紅十字會難民營。在自己的土地上，尋求英、美、法等國旗幟下的庇護。



蘇達立的中國紅十字會杭州分會會員證 -- 副會長 (1949年)

就像是暴風雨前夜四散奔逃的螞蟻，1937年10月底開始，有能力逃走的市民，都儘可能帶著所有財物離開了杭州。到了11月20日，原本人口80萬的杭州城只剩下10萬人左右。另有約10萬人暫時逃離了市區，隱匿在郊區各村鎮。杭州扶輪社的38名社員，許多也分散了。所有人都在觀望動靜，但他們並不知道，第二天等來的究竟是黎明的曙光，還是更漫長的黑夜。

11月16日，茅以升在錢塘江大橋工程處接待了一位南京政府派來的重要客人，他是南京工兵學校丁教官。在出示了一份南京政府絕密文件後，丁教官對茅以升說，如果杭州不保，錢塘江大橋就等於是給日本人造的。丁教官告訴茅以升，炸藥已直接由南京運來。

11月30日，日軍出動飛機28架次，在蕭山縣城城廂鎮上空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地毯式轟炸。這次轟炸中，日機共投下各類炸彈120枚，造成近200人喪失性命，1,000餘人被炸傷炸殘。

12月23日，為阻滯日軍南下，茅以升揮淚炸毀了全面通車僅89天的錢塘江大橋，只留下殘存的橋墩。在大橋被炸的那天晚上，茅以升在書桌前寫下：「抗戰必勝，此橋必復」。

12月24日聖誕節前夕，杭州淪陷。東路岡井部隊入清泰、望江兩門；北路孤川部隊進武林門西大街；西路三林部隊由鳳山門進入杭州。日軍沿途燒殺擄掠，使城市受到極大破壞。杭州由此開始了長達八年的鐵蹄下生涯。聖誕節，這個本應充滿和平與友愛的節日，對於當時的杭州百姓來說，卻是苦難的開始。蘇達立在日記中記錄：「聖誕節中午，日軍開始大規模佔據杭州的房屋。傍晚衝進民房肆意掠奪，杭州慘遭恐怖統治的序幕被拉開。全杭州市90%被劫掠，許多婦女慘遭凌辱。12歲到60歲的婦女在此時都失去安全感，時常有受害婦女被送進醫院治療。另一種駭人聽聞的事件，是日軍放火燒屋。數處火警都很靠近醫院……」

英國著名記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當時身在杭州，每天都要領著城內亟待幫助的婦孺撤入廣濟醫院中。他寫道：「自日軍佔領杭州以來，我們的醫院(廣濟醫院)裡面就有許多受難的婦女。其中兩個因為日本兵追逐從樓上的窗口跳下，折斷了背骨，一個並且折斷了腿骨。搶劫、傷害、屠殺、姦淫、放火，有增無減。整個杭州變成了恐怖的城市，只有外國人的房屋內和收容所內是安全的。」

杭州淪陷後，蘇達立經常以紅十字會副會長的身份巡視市郊小村鎮，救治傷員。有一次在杜橋，蘇達立救出遭日軍大炮轟擊的村民 33 人；第二天又從大火中救出數位婦女。在另一個村子，蘇達立和醫院員工與日本兵遭遇。出示紅十字會證件後，仍被日軍帶到部隊檢查，核准後才放行；此行又救出 23 人。

當時的杭州，已經從天堂跌落煉獄。1938 年 2 月 18 日，日軍瘋狂屠殺餘杭縣喬司鎮居民，施放火槍燒房子，用步槍和機槍掃射群眾。日軍連續燒殺 3 天，被害平民達 1,300 餘人，燒毀房屋 7,000 餘間，整個喬司鎮成為一片廢墟。事後，人們收集遺骸建公墓，立碑為「戊寅公墓」，俗稱「千人坑」。(圖見第 15 頁)

3 月 4 日，日軍包圍新登縣長新鄉東塢山村的午朝廟，將在那裏避難的 300 餘難民集中起來。分年齡將各人的拇指連拴在一起，並令他們下跪，然後架起機槍掃射屠殺，僅得 5-6 人倖存。

3 月 26 日，1,000 多名日軍將龍溪沿岸的村鎮燒殺。龍溪南段與京杭大運河相接，北段通往吳興匯入太湖。日軍佔領杭州後，龍溪是運送軍火物質的要道。為確保杭湖水道的安全，日軍製造了火燒百里龍溪的慘案。在 120 里的龍溪兩岸，近 150 個村莊成了一片火海。據統計，僅德清境內龍溪兩岸就有 110 個村莊燒毀，7,700 多間房舍被焚，死亡 580 餘人。

蘇達立記錄道：「1938 年初，開口已是無人地帶。只見到處是遺棄的屍體，因無人收屍而臭氣熏天。有的剛被槍彈射死不久，仍浸在血泊中；也有無頭屍體仍保持跪下姿勢；有被砍頭而未全斷；背部被劈開的…」就連慣看生死的醫師蘇達立都忍不住感嘆道：「其恐怖淒慘狀，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不久之後，日本憲兵侵入廣濟醫院並架設機關槍，強行擄走 103 名國軍痊癒期傷兵。蘇達立憤而抗議，並與英國駐上海領事館聯絡，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加以報導。最後日軍當局為緩和各方譴責，允許蘇達立攜帶少量糧包探監，後來又允許每周探監診療。

當時，美國基督教北浸禮會差會(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的蕙蘭中學(Wayland Academy)也是杭州城內主要的避難處。難民的數量還是遠遠超出了預設，以至於避難處的人們只能擠擠挨挨地坐在水泥地上。難民一天只能吃一頓燒得很爛的米飯，一周有三天能吃上鹽，四天能吃少量的鹹菜。蕙蘭中學校長葛烈騰(Edward H. Clayton)在回憶錄《Heaven Below》《人間世》中寫道：「(條件艱苦)但他們都不在乎。只要能進來，坐在美國國旗下，得到紅十字會的幫助，他們別無所求。」城內的避難處需要有人徹夜巡邏，以攔住想要闖進來索要婦女的日本士兵。

杭州淪陷後至 1939 年之前，廣濟醫院醫治了中國傷兵一千多人。在這座城市最危急的時刻，廣濟醫院、蕙蘭中學、法國天主教會仁愛醫院、弘道女子中學(Hangchow Union Girls' School)

以及基督教青年會(YMCA)等機構作為避難所，共接納了 2 萬 5 千名婦女和兒童。蘇達立於 1939 年安頓好了妻子和兩個女兒回英國後，毅然獨自返回苦難中的中國，繼續耶穌基督的使命。

1941 年日本帝國海軍於美國時間 12 月 7 日對美國領地夏威夷的珍珠港(Pearl Harbor, Hawaii)海軍基地偷襲，太平洋戰爭爆發。偷襲珍珠港事件被視為向美國和盟國宣戰，日本帝國同時入侵英國殖民地香港及中國境內各同盟國租界。美國、中華民國及一眾英聯邦國家隨即在同一日對日本宣戰。12 月 8 日傍晚，日軍突然闖入佔領廣濟醫院，英國籍員工大部分被遷居至癲瘋病院。此後，醫院的院務雖然能夠繼續維持，但處在日本憲兵隨時「監視搜查」中。

1942 年 11 月 11 日下午，蘇達立被 4 名日本憲兵拘捕，第二天就被押送到上海海防路(Hải Phòng Road)集中營監禁。集中營內關押了英、美、丹麥、比利時、希臘等國的 360 名外僑，年齡最小者 21 歲，最大者已 74 歲，日軍稱他們為「危險的戰犯」。蘇達立記載：「營犯中時常有人隨時被憲兵提到總部詰問或被特別拘禁，時間從 24 小時到 3 個月不等。各國男女混雜，擁擠污穢，受盡凌辱和飢餓。」

隨著抗戰勝利的天秤越來越傾向中國，日軍瘋狂反撲。一方面抓緊構築防禦工事，另一方面將在上海日軍集中營的外僑轉移到北平。1945 年 6 月底，蘇達立隨同其他外僑被強行「轉移」到北平郊區豐臺一個「在日軍嚴密軍事管制防衛，甚至連日軍士兵都不允許閱讀任何報紙」的集中營。直到 1945 年 8 月日本帝國戰敗投降後，才獲得釋放。蘇達立回到杭州，繼續擔任廣濟醫院院長。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建政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鮮戰爭爆發，掀起「抗美援朝」的熱潮，參加戰爭 16 個盟國的僑民必須離開中國。1951 年，蘇達立將廣濟醫院完整地移交給人民政府後，即要離開他生活了近 30 年的杭州及美麗西湖前往香港。繼續服務中國人民，直到 1970 年在香港去世。



蘇達立(前右 3)與廣濟醫院職工合照



蘇達立伉儷(二排中)與廣濟醫院職工合照



1939年將妻子女兒送返英國前，蘇達立與家人在杭州的最後一張合影。



「八·一四」空戰---中華民國空軍主力機型：美國製造老鷹三型(Hawk III)戰鬥機



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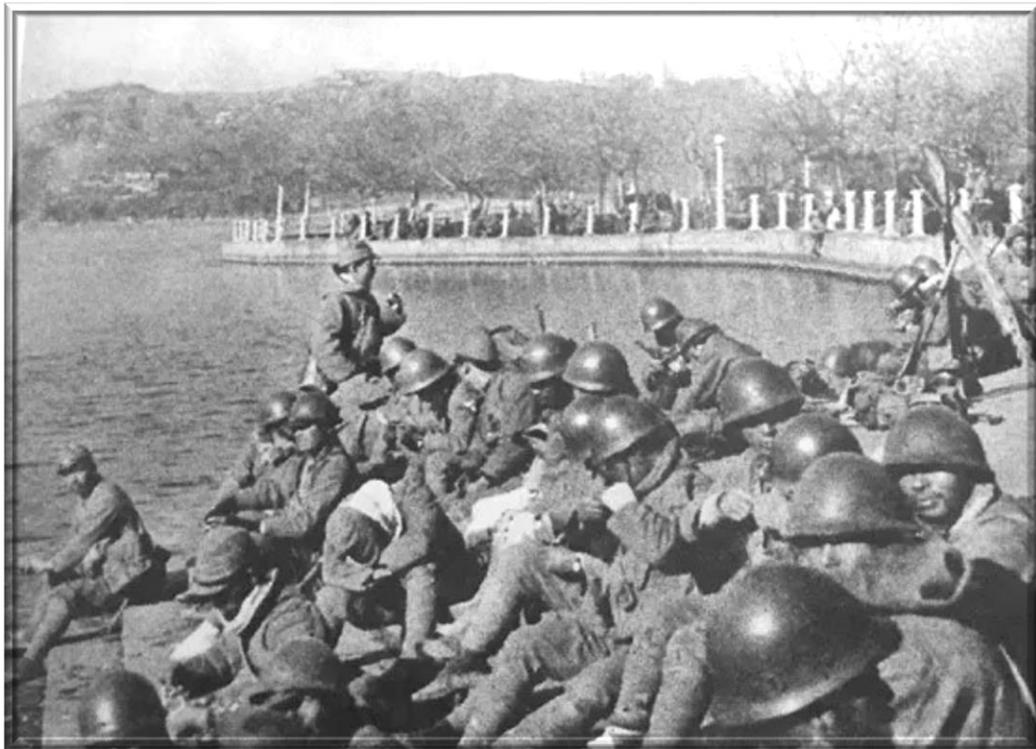
日軍騎兵踏過西湖斷橋



日軍坦克碾過西湖湖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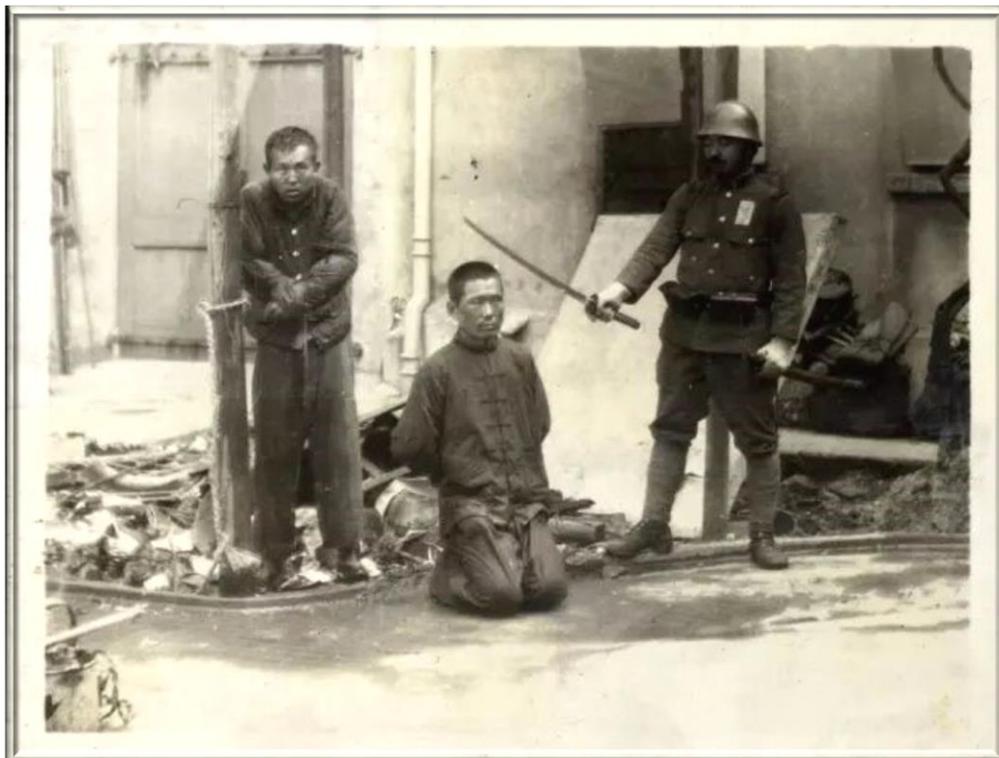
日軍在西湖邊



日軍在西湖邊



日軍準備坑殺杭州百姓



日軍正在殺害被俘的杭州軍民，由隨軍記者拍攝。



日軍攻佔杭州後，在岳飛墓前耀武揚威。



今天的「戊寅公墓」場景



蘇達立使用過的打字機，現存於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獻身痲瘋防治事業的蘇達立醫師

痲瘋病 (Leprosy)，又作麻風、麻瘋、癩病、癘風，醫學領域稱為漢生病或韓森氏病 (Hansen's Disease)。是由痲瘋桿菌與瀰漫型痲瘋分枝桿菌引起的一種慢性傳染病，主要經由飛沫傳染，但傳染性並不強。感染初期不會出現症狀，潛伏期可達 5 至 20 年。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多。此症主要侵犯人體周邊神經，以及皮膚、黏膜。早期的症狀包括皮膚出現紅色或白色斑塊、丘疹以及結節，並且喪失感覺。如果沒有妥善治療，晚期痲瘋會對患者帶來嚴重的傷害。可能造成失明、耳聾、魚鱗癬、爪型手、鼻樑塌陷、眉毛脫落、獅樣臉 (leonine faces) 以及四肢潰爛等。過去由於痲瘋病人外貌有巨大改變，因此人們認為痲瘋病是危險的不治之症。在十九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痲瘋病相當普遍的傳染，是令人聞之色變、高度污名化的疫病。很長的一段時間，政府採取隔離政策，建村建病院。一般民眾對痲瘋病人避之唯恐不及，視他們為「瘟神」。這種高度懼怕與厭惡之情，也連帶影響了社會對痲瘋科醫生的觀感。自此，痲瘋不再只是「單純的疾病」，更牽涉社會福祉、污名歧視和結構性暴力等議題。

基督教會把救治痲瘋病人視為對耶穌愛德的繼承，是慈愛精神的表現。傳教士以他們慈善博愛與奉獻的精神救治患者的同時，引導他們逐步恢復對生活的信心。教導病患者學習手藝或耕種，幫助他們回歸正常生活。由於專業的管理，加之治療水平提高，使以前認為不能治療或制止蔓延的痲瘋病，得到了良好療效。不少治癒者出院與親人團聚，並能正常從事勞動生產。

英國劍橋大學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醫學博士蘇達立，原先是一名海軍軍醫。1921 年，他受英國聖公會派遣至杭州廣濟醫院和痲瘋病院從事 X 線攝片及痲瘋病治療工作，隨後即擔任廣濟醫院和廣濟痲瘋病院院長。蘇達立接管痲瘋病院時條件較差，當時的痲瘋病院在市區的廣濟醫院設有痲瘋病門診，同時在松木場許家灣小石山設有痲瘋住院病區。病區的房屋由於維護較少，已經十分破爛。醫院整體環境也不夠理想，在外界的聲譽也不高。至 1924 年，才收治療痲瘋病人 60 名。加之 1927 年時國民政府從英國人手裡收回廣濟痲瘋病院，公立經營了 16 個月。期間經費困難，病人死亡率高。部分病人自動出院回家，防治工作更是遭到嚴重挫折。

面對此種情況，蘇達立積極與英國國際痲瘋救濟會 (International Leprosy Association) 聯繫。1928 年又從國民政府手裡接管了廣濟痲瘋病院。收回痲瘋病院後，為改善痲瘋病區環境，蘇達立積極爭取英國國際痲瘋救濟會的援助，於 1930 年在病區新建了磚木結構的男女病房、禮拜堂 (聖約翰堂)、診療室等。環境較前大為改觀，廣濟痲瘋病院一躍成為當時國內硬體設備最好的痲瘋病院之一。

作為痲瘋病院的院長，痲瘋病治療不是蘇達立醫師的強項。雖然他也參與治療痲瘋病人，但他重點通過吸引痲瘋防治專業人才來院工作或訪問的方法，來提高醫院痲瘋治療水準。1928 年，他聘請了赫特醫生 (Dr. Phyllis Haddow) 來院負責痲瘋病的治療工作，主要使用口服大楓子油及肌肉注射大楓子油乙酯兩種方法。據觀察約有近 40% 患者治療有效；後來曾經有海根葛醫生 (Dr. Lee S. Huigenga) 來杭州時，提出了許多有關痲瘋治療方面的建議，促進了痲瘋治療水準的提高。1947 年，更請到了世界著名痲瘋專家馬雅各醫生 (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來廣濟痲

瘋病院工作。他使用礮類藥治療癲瘋病的成熟經驗，使廣濟的癲瘋治療水準與國際癲瘋治療水準接軌，並由此吸引了大批鄰近省市及軍隊癲瘋病人前來就診。

護理工作也在蘇達立負責期間得到加強並取得成效。癲瘋病院的歷任英國護士長毛禮斯小姐 (Sister S. Morris) 等，均訓練輕症癲瘋病人從事癲瘋護理及清潔工作。緩解了護理壓力，使眾多的病人收益很大。有些病人可以自行清洗潰瘍，包紮傷口，測量體溫，肌肉注射，分擔了不少護理工作。對於同時有精神病的患者，也專闢病室居住，以便照顧、護理。同時也保證了其他病人治療生活的安心、寧靜。

當時廣濟癲瘋病院的生活，也一定程度得到改善。蘇達立通過各種途徑，積極爭取英國國際癲瘋救濟會對病人的定期生活補助；並與杭州的市長等交涉，獲得了一定糧食物資援助；還爭取到了讓病區癲瘋病人，在病院周圍自由活動的權利。醫院安排了輕症病人從事園藝、燒飯、看管大門、洗衣等工作，通過病人間的互助改善集體生活。同時，還挑選了兩名擔任過小學教師的病人，來指導沒有文化的病人學習文化。醫院也不斷吸收有文化的輕症病人，參加基督教的一些宗教活動。

1941 年 7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侵略者將蘇達立等人送往戰俘集中營，廣濟癲瘋醫院無人過問。那時病人四散逃難，只剩下 18 名肢體殘疾病人無家可歸。在醫院附近挖野菜度日，生活苦不堪言。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對癲瘋不加過問。廣濟癲瘋病院仍然由英國聖公會接管，蘇達立仍然兼任癲瘋病院院長；並恢復了與英國國際癲瘋救濟會的聯繫，癲瘋病院逐漸恢復原狀。蘇達立居住在杭州廣濟醫院內，廣濟醫院有許多日常事務需要他處理。但無論工作多忙，他都堅持每週一次到癲瘋病院，處理行政管理事宜並親自治療病人。通過幾年的努力，杭州廣濟癲瘋病院的聲譽又逐漸傳遍全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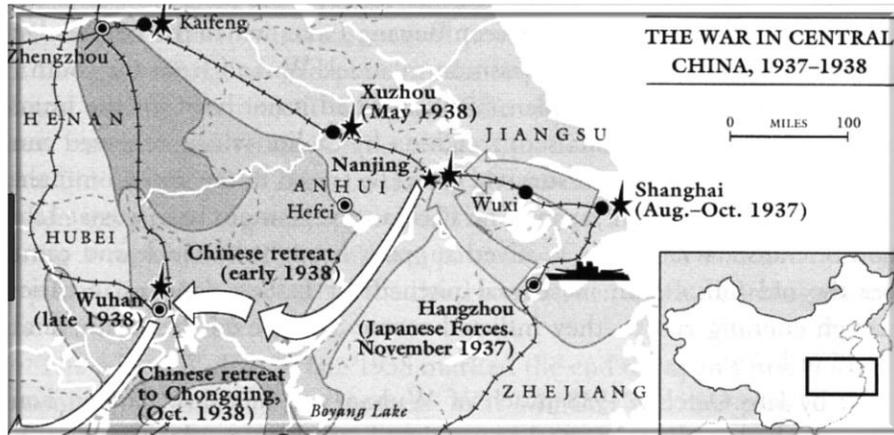
1948 年，鑒於癲瘋治療住院的病人日漸增多，蘇達立與醫務部主任馬雅各一起籌畫癲瘋病院擴大事宜。1949 年在武康上柏的鴻漸嶺，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癲瘋村」形式的農場。其農場經營與癲瘋治療相結合的經驗與成效，引起了國內外許多同行的重視。上柏癲瘋農場成為日後廣濟癲瘋病院遷移武康的基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建政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鮮戰爭爆發，掀起「抗美援朝」的愛國熱潮，參加戰爭 16 個盟國的僑民必須離開中國。1951 年，蘇達立將廣濟醫院/廣濟癲瘋病院完整地移交給人民政府後，即要離開他生活了近 30 年的杭州及美麗西湖前往香港。繼續服務中國人民，直到 1970 年在香港去世。

蘇達立作為一名醫學博士的外國人，三十年如一日，為浙江的癲瘋防治事業超我服務，無私奉獻。他通過爭取外援，重用人才，改善服務，創建農場等舉措，使廣濟癲瘋病院處於當時中國癲瘋防治的領先水平。浙江癲瘋防治的歷史，將永遠記住他的名字——英國傳教士蘇達立醫師。



1937年11月日本帝國海軍陸戰隊侵略杭州示意圖



從1931年9月到1945年8月--日本帝國侵略中華民國領土（黃色部分）示意圖

